

他山之石

郝堂村,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一个曾再普通不过的村庄,却有点“另类”。4年前,郝堂还是大别山革命老区一个凋敝村落,“静得吓人”。而如今,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回来了,迁出的户口又迁回来;远远近近的城里人纷至沓来,堵车竟成家常便饭。人气惊人逆袭。很多村,生怕像农村,撤村并居、大拆大建,“去农村化”毫不含糊,越变越像缩小版的城市。

郝堂,就怕不像农村。坚持不扒房,只修复,留下时间的痕迹。敬畏村庄原有肌理,大树不砍,河塘不填,邻居还是原来的邻居。守住村子原有的魂儿,改造成了一个升级版的农村。别的村,追求把房屋建得很漂亮,恨不得成为又一个“周庄”,旅游立村,“是让外面人来看的”。郝堂,则是围绕让村里人的小日子过好来建的,“说白了就不是让外面人来看的”。改善水、改厕、改厨、改房,建学校、卫生室、图书馆,不粗制滥造,不短视功利,现代的也现代,传统的也传统。头顶“中国最美休闲乡村”的光环,郝堂建的是家园、共同体,老百姓过的是小日子,“被旅游”只是意外收获。

别的村,去一次未必再去,可郝堂来过还想来。比不得水乡小镇,比不得豫瓦古村,郝堂让人看到了什么?“前三十年看小岗,后三十年看郝堂。”虽是一家之言,却也一语中的:“最美”郝堂,美在“村”,美在激活乡村价值、尊严、自信,美在一种“既有疼痛,也有憧憬,蕴含着未来和希望”的感动。

缘起——

不能消失的农村怎么办

几年前,郝堂同很多村庄一样,几近空心,只留下空巢老人,山上板栗熟了都无人摘。但凡有足够能力、头脑、出息的,都出去了。人们常说,走吧,过不了10年,村就没了。

村里种稻种茶,都不多,没什么像样资源。入冬就烧炭,满山沟冒黑烟。“穷到挑柴卖草,山里跑兔子都看得见。”垃圾遍地,塞满河道。老人得病,累及打工的儿女,有的甚至寻了短见。

61岁的胡静17岁嫁到郝堂,当了30多年的村干部,今年接任村支书,提起农村,她苦恼:“相比30年前,日子是好过了,可农民为啥连在农村生活的自信都没有了?”随便问村里小孩,长大了,他肯定说要进城。

2012年底记者到郝堂的时候,一路雨雪,村子却很“抖擞”。不止岗上的植被、塘里的莲蓬抖擞,人也很抖擞。进了郝堂的地界,便再看不见垃圾。数九寒天,堰坝下溪声朗朗,农户似紧似慢忙着“庭院革命”。

那时,郝堂村正破茧成蝶。

村部周围200余亩水田返租倒包给村集体,“摇曳”成百亩荷塘,既是景观,也能增收,还是生活污水经过农家三级化粪自然净化的最后归宿。

破败的村小学,搬到了风景独好的半山腰,引来城里重点小学的名师当校长。硬件软件焕然一新,学生人数从最初的60多名留守儿童,一下回流到200多人。

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回来了,不再是一副随时拔腿走人的样子,快要废弃的老房子翻修了,回归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狗头门楼、清水墙。村庄人气、生气在集聚。

普普通通的郝堂,似乎是村庄发展的一种例外。其时,在全国各地,村庄每天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——或者成为土地“增减挂钩”的指标被推平,或者被一片片或粗或精的高楼社区所取代。俨然,那便是未来农村。

“现在很多人到郝堂大谈旅游,但郝堂开建时,我们就没有想过要在这个地方弄个旅游点,而是在中央精神指导下,着眼农村价值和农民幸福,打造一个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农村升级版。”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始终关注着郝堂,念兹在兹的是“不能让它走偏了”。

发展郝堂也遇到了尖锐的争论:“一个挣扎的村庄迟早将衰落、拆掉,为它花钱,值吗?50万元架电线,只为收50元电费?”

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,时任区长,他坚信自己的认识:“农村是有价值的,农民是有尊严的,农业是有前途的。”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%以上,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,“不能消失的农村怎么办?不能变成市民的农民怎么办?农村不能成为生产粮食的人的‘工棚’!发展不只有经济账,还有社会账,发展共享是公平账!”

为什么选郝堂作为全区农村可持续发展项目试点村,胡静听过很多解释。有人说,郝堂再穷也没砍村里仅剩的十余棵大树,这个村有敬畏。有人说,一位专家在平桥职业学校看到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塑像,有感于心。

其实有偶然也有必然。郝堂距市区20来分钟车程,不远不近。村两委班子想干事也能干事。最重要的是,郝堂太普通,普通到没有特点,没有资源,这样的村庄,才有代表性。

有人劝胡静别折腾了,这位时任村委会主任的“铁娘子”却吃了秤砣铁了心:“干了一辈子,咱村干部被认为‘不是要钱要粮,就是上环结扎’,难道我们就不会干点村民打心里欢迎的事?”

破题——

从小事里改变的村庄

早在2009年,胡静在多方帮助下筹办养老互助金,请村里老人入股,每人2000元,当年15人参加。年底,每位老人得到了300多元的分红。钱虽然少,红包发到手里时,台下老人哭了。

正是这件事,极大提高了村两委的凝聚力。政府曾号召过养鸡鸭,种板栗,喂獭兔,村民总习惯性怀疑。可这一次,钱是实实在在的。

2011年,政府陆续引来专家团队参与郝堂试验,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叫孙君。孙君团队是做乡村建设项目的。他不避讳过去的失败。有的村做好了,专家一离开又退了回去。

专家经验与基层探索碰出了共通的理念,但对于郝堂不会有现成的路径。孙君本是画家,转投农村建设,还带着画家的率性。农民看他裤子有洞,估摸他穷,妇女看他画有人体,躲着怕是流氓。会上他感性,“改变郝堂,给我两个春天”;进村他朴实,虽不吸烟,有农民递,他接过来说就抽。久了,全村人见他都恭恭敬敬:“孙老师!”

接受平桥区的委托前,孙君给郝堂留了考题:3个月,全村能不能完成垃圾分类?做大事一定先把小事做好。小事花钱不多,但可以把人凝聚在一起,让村民觉得,每人每家做一点事,一个村庄就有改变。”

孩子们最早被动员起来,去一家一户评比卫生。孩子一丝不苟,也不讲情面。谁家卫生好,孩子们就啪啪鼓掌。谁家差,主人脸上先挂不住。

3个月,大城市都喊难的垃圾分类,郝堂做到了。先得发脸盆,床单鼓励。接着,家里干净,门外垃圾就不顺眼,再后来,河沟都被捡了个干净,村民再见不得地上脏。

村庄建设,每一个环节都得精细。村施工队负责修垃圾池,返工了5次。孙君算过,村里平均15年建一次房,“从现在开始,注重建筑质量,郝堂的目标是建50年不落后的房子!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,农村似乎就可以粗制滥



郝堂 留住乡愁

人民日报记者 龚金星 禹伟良 王汉超



里来开店的不习惯,说门外不该他管。沿路丢垃圾,下塘折莲花的,往往是外来的游客,村里保洁老太太跟着一路捡。

吴凤超是80后,打工14年,现在带着家人回来,户口也从城市往回迁。他记得,过去村里偷个鸡摸个菜,拎个锅弄个油的事不少,现在夜不闭户。

如果仅复制郝堂的房,复制不了郝堂的神儿。很多内功,是看不见的。

在郝堂,所有的事情,必须跟老百姓商量着来。村庄能不能进车子?村里开村民会,一直开到夜里11点多,争吵的结果是:晚上游客少了可以进车,其余时间不能。

村规民约都是大伙这样吵出来的。村庄建设的“大事记”,厚厚一本,村里开的群众会数不胜数。有这样协商沟通过程,村两委强了,群众也认他们。如此建起的,是家园,是共同体。

如果想看轰轰烈烈的经济效益,很难看出郝堂的名堂。郝堂项目强调不过度注资,甚至对外来资本保有警觉,“引入建设主体时,一定不能剥夺村民的权益,不能把农民挤出去。”小小一粒莲子,本村人采,本村人卖,荷塘也是集体的。这样,虽说规模做不大,效率不是最高,可制度设计就这样,哪怕有一丁点挣钱的机会,都要给村民。

郝堂项目协调人禹明善总结,表面看,郝堂修的是房,其实重建的是信心,凝聚的是要素,修复的是村里的小社会,重现的是集体的活力。集体有资产了,才能管起大家的事,就像蜂蜜,最让蚂蚁抱在一起。

碰撞——观念的争吵与和解

农民改自家的房,没怎么想过旅游。可郝堂还是触动了无数外来的客人。

很多人找到了记忆中的乡村。乡村是有生机的,长着大树,升着炊烟,水里有鱼有虾;村里人是和善的,打着招呼,让你去家里吃饭……中华民族的根、文化的魂在农村,人们和泥土有着天然的亲近。在郝堂,大人找到了回归,城里孩子来了不愿走。晚上大大的月亮升起来,曾有孩子兴奋地问:“爸爸,那是什么灯?”

小小的郝堂,承载城市的差异,承载泥土根脉,承载故土乡愁。每到周末游客一两万人。问他们,看什么?往往,不知道,就是想看。

每一种情愫,每一个细节,都映射着城乡的碰撞。譬如有人说:“村口小摊的户外太阳伞,应换成油纸伞……”马上有人打断:“农民不干!”

农民要什么?村里要有路灯。可是,农村宁静的夜晚不是他的美吗?过多的光线属于城市。最后路灯用了最节制的光。

有人说,房子是好看,就是电线杆乱,电线为什么不入地?有道理。可是,农村经常动土,碰断了,麻烦又浪费。

路、河,规划征地要截弯取直……慢着,这是农村,为什么不依照既有的山形水势?

美化绿化,规划的树种开始是百日红、樱花。可是,它们不是土生土长的,要全部清除。

为什么总碰撞?郝堂发现,原来总用城市思维,求解农村的问题;总沿城市走过的路,认知农村的方向。比如,城市污水集中处理,农村也学,但怎能让农民每家掏污水处理费呢?

郝堂是多解的。郝堂的意图,胡静看重“村庄新生,村业壮大”。孙德华是五里店办事处派驻村的包村干部,他看重“农民对自身文化的尊重,并获得了自身建设、自我发展的能力”。五里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苏永华则说,郝堂价值在于“美丽乡村要用实干精神去‘慢慢’打造,用人文情怀去精心雕琢”。

也有疑惑:“农村活了,农民富了,可农业还是没人干。”30出头的胡涛上海有厂,每年销售额达千万元。他回来种地,种原种稻。他说:“村里种的地少,收益还是太低。”

还有更深的疑问:“离了帮助谈郝堂复制,能够自主进行吗?”“面对城镇化的趋势,该引导农民走还是留?”郝堂已经触碰到了更深远的话题: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?

复制——待到山花烂漫时

有人评价郝堂是农村优秀部分的复兴。然而复制郝堂,难在郝堂并无模式,因地制宜。但最大的难题,是人。都市的设计师、大腕们建不了,他们接不到农村的地气。有一些到农村开发的新锐,他们要的是乡间别墅,在乎的不是农民。农村,人才都在往外流,有几个愿意和农民一起打造一个“郝堂”?

别的不说,连身怀乡土建筑技艺的工匠都成了“稀世珍宝”。鲍国志做园林,李开良建房子,因为来到郝堂,各自改变了轨迹。孙君画张画,李开良们能比着建出来,“建的比画的还好”。孙君说,他们没有学历,没有职称。我们这些人,画家、专家、学者的光环掩盖了他们。

这两个人,带着郝堂的理念,把复制郝堂当成了事业。

郝堂管他俩,一个叫老李,一个叫老鲍。老李脾气怪,不爱说话。他今年住了一次院,郝堂村民一拨一拨去看他。他不吃房主的饭,让房主省钱买好料。料差,他二话不说给扔出去。盖得不满意他就拆了重来,费料费工,谁也不敢顶撞他。他离开郝堂时,他的狗赖在村里,说啥也不走。村里发现,只有叫老李,那狗才应。天天这么叫,好像老李真没走。

老鲍也较真。房子改出来,不见得顺,待他花点时间,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。但他俩,整天争,面红耳赤。就是这俩人,像种子一样,从郝堂到了新集村。在平桥区,新集就是第二个郝堂。

有人说郝堂有茶山小河,是沾了旅游资源的光。新集是个平原村,啥也没有。新集的故事,源于老教师张立培。他放着明港二中的总务处副主任,自费30多万元,去新集村支教。村小学破败到只剩下17个留守儿童。但他不放弃,建食堂、修寝室,吸引众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寄宿就读。

“以恢复乡村教育功能引领文化复兴和村庄建设”,2014年平桥区改扩建了新集小学,一下子涌来几百留守儿童入学。按郝堂的经验,在村庄倡导垃圾分类,按群众意愿鼓励村居改造。

老李和老鲍大显身手。得益于郝堂“练手”,新集的改造更加得心应手。一个几乎成为废墟的小院改造成了孩子们的绘本馆。一片老屋,成了雅致的茶社。

没有太多复杂的过程,新集活了。垃圾资源分类,比郝堂坚持的还好。走进处理中心,没什么异味,这个夸奖让垃圾工肖全珍很得意。从满村垃圾,到现在细致地回收,她觉得自己特有价值,满满自豪。说话间,从一片杂物中,拣出一枚细小的纽扣电池,“这个丢到地里,毒很大。”

为了回村专职做垃圾分类,她放弃了北京的保姆工作和几千元月薪。丈夫以前是“老人上访”,如今一门心思收垃圾。

老鲍受邀远赴豫北,如今在黄河岸边河南孟州主持一个村庄的修复。那边有位90多岁的工匠,白须飘飘,感遇村庄复苏,重操技艺。

在郝堂的周边,没有补助,村民也在热火朝天改房子。自己设计,有模有样。这一带,人们再也不盖水泥板、白瓷砖的楼房了。农民就地取材,还搞出了雨污分流系统。

走在最前的郝堂,却遇到了新的问题。郝堂因村庄而引人,可引人带来的发展冲动要占地,要扩张,却威胁了村庄。郝堂比两年前乱了,一些类似城市社区的管理问题露了苗头。有人对王继军说,郝堂建得越好,在商业化的浪潮中破产得越快。王继军曾因占地砍树生过气,把手机都扔了,掉到了河里。但这一次,他很平静:“郝堂的意义已经体现,一个村庄有他自己的发展,也有他自身的调适。”

的确,发展冲动之于郝堂还是太少,他今天还不仅是村民的郝堂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最好的郝堂,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。

图①:郝堂民居。

图②:郝堂农家。

李江河摄

资料图片

(原载《人民日报》2015年12月25日第十六版)

蜕变——社会修复,化育民风

董光辉在郑州本已是一家报社的高管。2013年他无意中来到郝堂。9天后,他把全家都搬了过来。

当时孩子还有十几天放假,他说“不等了,搬家”。辞了职,驱车4趟,彻底成了郝堂的居民。在城市,他每天深夜2点还在熬夜。在村里他晚上8点半睡觉,清晨6点半跑步。他理由很简单,这里能给孩子最好的童年。

村里孩子见人问好,知道把瓜子壳捏在手里,不随地乱丢。学校就在村旁小山上,钟声响彻山湾。学校是政府和社会投资,台湾设计师为孩子们做的干厕,环保,参观者一拨又一拨。干厕的肥料可以用在孩子们每人分到的那块小菜地上。自家的狗跟着孩子们上下学。学校拿大还真当教具,带学生认花认草,炒茶品茶。“如果农村的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了,大了以后怎么会记得住乡愁?”校长杨文平坚持做理想中的乡教教育,不为“唯赚出农民论”而“自废武功”。

在郝堂,村民自扫门前屋后垃圾。反倒是城